

## 郑振铎《日记》手稿

刘 旭

在我国新文学史上，郑振铎是一员奋战了四十年的健将。正如五四时期很多先进青年那样，他很早取得成绩，建树是多方面的。郑振铎对新诗、散文、小说都有贡献。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成绩卓著，也写过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的著作。对古籍整理、文物考古，也有新的开拓。他参加发起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编辑《小说月报》，具有热诚的社会活动家的才干。开国以后，他是年轻的共和国第一任的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1953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6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国际文化交往方面，他是一个活跃的战斗战士。他热情、坦率、真诚、厚道、精力充沛。最后，他在率领文化代表团访问友好国家时，因飞机遇险，不幸殉职。

郑振铎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位历史人物。最近，我有幸读到了北京图书馆藏郑振铎《日记》手稿。它是研究郑振铎的第一手的宝贵资料。

现存郑振铎《日记》手稿，共有十四本。最早写于1927年。

1941年到1948年期间，只有1947年的日记没有见到。解放以后的日记，没有见到1950年的，其余的年分都有。他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58年10月16日，这是他牺牲的前一天。他还留下了三本工作札记，也可与日记参看。

## 刻苦自励

早在五四时期，郑振铎就提倡文学要有益于人生。同样，他希望自己的生命，也有益于人民。所以，他严以律己，刻苦自励。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大屠杀之后，郑振铎不得不亡命海外。1934年，《欧行日记》出版，收集了1927年5月21日至8月31日的日记。据郑振铎在该书“自记”中介绍，这部分日记是由高君箴细心保存下来的，约占旅欧日记的四分之一；其余的日记找不到了。这次，我见到了他1927年11月底至1928年2月底的日记，十分高兴。

1927年11月30日，是他三十岁生日。他在日记中激励自己说：“‘人生半途’一事无成，不自愧欤？”<sup>①</sup>然后，他订出了今后的努力目标：

（一）读书毋草率；每读一书必一页一页读过。随有所见，即作札记。

（二）当日事当日即做。

（三）毋游惰费时。

（四）毋逞妄想。

（五）做事读书，须有秩序。

---

<sup>①</sup>引文凡未注出处者，皆引自郑振铎《日记》手稿。

(六) 每天须用功言语，英、法或德。

(七) 做文须先熟思，做毕要改。

(八) 不做非本行之文。

郑振铎过生日，并不记往日的成绩，总是想未来的工作。当时，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和写作的计划。他对自己的要求，写得具体、切实，真正做到颇不容易。

过了一个月，为1927年除夕。他在国外过年，丝毫没有异样的享受。除夕晚上，他在异国孤灯下，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也，旧的一切，皆成过去，新的一切，正待创造！低了头工作着；谨慎，深入，有恒！”“谨慎、深入、有恒”，又有创造精神，这足以代表郑振铎的风格。居留国外期间，他在每一天日记的前面，都写上一个数字，标明他在国外生活的天数，决不虚度光阴，这也表明他时刻怀念着祖国。正如他在《离别》这篇散文中写的，“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着的中国！”

刻苦自励，是贯串他一生的严肃的生活态度。1945年，他生活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藏名隐姓，过着沉闷的生活。这一年元旦，他在日记的扉页上题着：“不怕作得少，只怕断断续续，若能天天作，作得一定多。”这些话，朴素，实在，所以特别有力！

## 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解放前夕，他就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准备迎接人民的新时代。1948年元旦，他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毅然在日记上写道：“新官僚与流氓文化、买办资本三位一体，便演

出‘天理、国法、人情’俱丧尽斩绝之境，……我们这个社会，则不古不今，非农、非商、非工，大家相‘攘夺’，相掠取，恬不为耻，人人均为极端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为所欲为，无所约束，纲纪法字(?)一切不顾，所谓‘青黄不接’之时代是也。穷则变，变则通，将必有不同之时代接踵而起也。”

1949年3月下旬，他响应中共中央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秘密从香港进入解放区。接着，他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1949年5月23日随代表团一起回到北平。那天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十万人的欢迎大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郑振铎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十分兴奋。大会一直开到八点钟，在暮色苍茫中散会。会后，郑振铎“晤恩来，晚餐后，晤阿英，极为高兴！十一时半，睡。”

解放以后，郑振铎无论在政府工作，还是在人民团体的工作中，都努力学习和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1957年2月16日，他听了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认为“精闡之至，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未言。这是上最精彩的马列主义的一课。”2月27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同志在怀仁堂正式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郑振铎听了报告之后，郑重地记了日记：“听毛主席报告，谈到的，凡十二个问题，以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间的矛盾为主，而尤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说得更多些，足以解决了不少迷惑的见解。七时许，散，足足谈了四个小时，风趣横溢，时有妙譬，毫不觉得时间之长也。这才不是八股，这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尊重、爱戴，跃然纸上。

郑振铎参加政府工作之后，直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同志熟悉郑振铎。在一次公开的集会上，周恩来同志说，在座的郑振铎及其他几位，和我同年，都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

在场的人听了，都为之感动。郑振铎很尊重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常常把它记在日记本上。早在1949年11月10日，郑振铎负责筹备故宫的陈列。有了初步方案，就送周恩来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直率地指出：“旧的成分太多，应该把古物处改文物处。”郑振铎认真地记在日记本上，并且第二天写下了自己的体会。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艺术表现新中国，究竟怎么宣传？接着，他自己回答：“新的生活，新的人，新的国家。”“前途充分光明，不是痛苦无告，是有办法的，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教育作用，鼓舞作用，有新的，不要丑恶的东西。”

1950年4月28日，他记下了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要求。“在真理面前无特权，人人都可以得到的。要治病根，有一个关键，即要学毛泽东思想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周恩来同志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准备，进行批评时，“有时说得过一点”；但是，他提倡和风细雨的批评，他打了一个比喻，动手术时，“最好的医生血流得最少”。

1952年5月31日，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创作问题十分严重，好的作品实在太少了，过去能写的人，都不大写了。怎样鼓励他们写，指导他们，帮助他们怎样正确的选材与写法。”郑振铎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些话，并联系自己的工作进行思考。

他在1956年2月19日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八十天国外访问的情况的报告，激动地记：“深入浅出，极为动人。今天的国际形势，可了如指掌矣。‘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直到八时，方才散会。坐了五个半小时，而无倦容，可见其吸引力之大。”

1958年，组织文艺节目出国演出前，他请陈毅同志来提意见。陈毅同志指出：“不要迁就外国人，不要四不象，要有自己的气魄，自己的风格。”郑振铎对这几句话深为赞赏。

## 自编年谱

1952年的日记本上，有郑振铎自编的年谱，兹录于下，

- 1898 生  
1911——辛亥革命  
1917——到北京，进铁路学校  
1919——五四运动—社研会  
1920——毕业  
1921——到上海 商务 学灯  
1922—27 小说月报  
1927——大革命，到英国  
1928——回国，商务  
1928—31——商务，复旦，中公  
1931—34——燕大，清华  
“九一八” 文学季刊、文学  
1934 回上海 暨大 世界文库  
1934—1937 暨大 抗日战争  
1937—1941 抢救旧书  
1941——珍珠港事变，蛰居——版画史 玄览堂 明季史料  
1941—45 蛰居，购书，售书  
1945—48 接收，南图，参考图谱，出书  
1949——北上，和大，政协，文物局

## 人民代表视察

郑振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也外出视察。他的视

察，简直是一场十分紧张的战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郑振铎的为人。

1956年4月，他到西北视察，重点注意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他在西安登上大雁塔，注意的是“风景依然，而四壁皆空，群众对此最有意见。似应搞些壁画，并辟若干玄奘纪念室。”人民代表重视群众的意见，这个意见提得好。据我所见，直到现在，塔内依然四壁皆空。他到半坡村博物馆，提出“尽量陈列起来”，强调“应尽量恢复原状”，并对人员编制等问题提出了意见。他见到出土的一对秦俑，十分兴奋，夸奖“又大又好，精美之极。秦人衣冠无可考，此是最重要的实物证据也。”现在，西安始皇陵的“车马坑”出土，更是蔚蔚大观，如果郑振铎在世，一定更为赞叹不止！他到昭陵，对唐代的雕刻极为赞赏，“这几个雕刻，各有特点，绝为刚劲有力，刀法简捷，而神采奕奕，应写一部专书来研究之。”他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观，看到屋内“空无所有”，希望搜集一些实物。4月25日，他与中共陕西省委、省人委座谈时，强调指出，要“明明白白地定出法律来”保护名胜古迹和文物。他希望省里的领导“尊重专家的意见”，互相协商。第二天，他与陕西博物馆考古人员座谈，提出了保护文物的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是：A. 吸取各地文物保护小组的经验，加以总结、推广；B. 宣传工作的加紧（对群众、也对干部）；C. 防止有意无意的破坏为第一要义；D. 古建筑的修整，要特别慎重；E. 修整以保固为主；F. 要树立标帜、界限（古墓尤重要）。郑振铎的意见，切实、具体，对文物保护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旅途颠波，过度劳累，他到了敦煌，就病了。五月六日记：“昨夜睡到中夜，忽觉腰痛欲折，辗转不能入睡。……便血。”但是，他仍然坚持紧张的工作。五月八日下午七时半，他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提出了六条建议：“1. 象保护

眼睛似的保护他们，既羡慕，又担心。一草一木，不可处理，一洞一石，不可挪损。2. 展开摄影工作，“图录”的基础。3. 供给‘资料’，不能包办，必须欢迎人家研究它，无穷的宝库，入宝山的，不会空手而回。4. 不能孤立地研究，佛教史、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历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要加紧学习。5. 要抓住重点，不能被动。不能因为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图录) 更有用。有益的东西先做。6. 经常除沙。被埋的洞，似南部很多，希望很大。”他勉励研究人员说：“敦煌学浩如烟海，前途无限，是史无前例的东西。”

郑振铎在座谈会上，虚心听取其他同志意见，一起研究具体的工作计划。当地的同志提出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需要研究资料，郑振铎能解决的，当场答应“尽量地供给他们”，这使“他们颇为满意而感动”。郑振铎了解到敦煌研究所地处偏僻，研究人员的孩子在当地上小学有困难，他就积极向省里反映，要求得到解决。

视察完毕后，六月一日，他到政协礼堂参加工作会议，详谈沿途见闻，“对于保护文物事，尤为慷慨激昂，不知有效果否？”我们可以看到，郑振铎视察毫不特殊，处处以身作则，勤奋工作。这样的人民代表，和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 普通劳动者

1958年，首都人民用自己的义务劳动修建十三陵水库。六月廿二日，郑振铎与国家机关的干部一起去参加劳动。清晨五点钟，他就起床，自己收拾行李。七点多钟集合时，周恩来同志约郑振铎同坐一个车去。上车后，周恩来同志关心考古工作，郑振铎就把河南安阳发掘的情况作了报告，要求当地党组织加强领导。周

恩来同志当场表示支持，立即派人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打了电话。这件重要的事情，很快就在开车前处理完毕。

到了十三陵，周恩来同志作了简短的动员。十三陵水库工地，集中了首都各行各业的劳动大军。郑振铎和国家机关近三百人在一起，安排在每天下午和晚上劳动六小时。从宿舍到工地，要走四公里，白天得走四十五分钟，晚上回来，天黑了，得走一小时。劳动的内容是为水库大坝运石块，活很重。郑振铎在日记上写道：“初次在太阳下走了那么远的路，颇见累乏。”过了一天，他记：“渐见熟练，且感到劳动的益处。”又过了一天，他说：“今天的劳动更见愉快，配合得也更好。人人都很兴奋，很有干劲。”适应了劳动生活之后，郑振铎在六月廿六日开始业余写《打井的人》。廿七日，工地开联欢会，他没有去，继续在宿舍写。那天下午写毕，共八千字。傍晚，交给了文艺大队。工地的生活是艰苦的。中午一菜一汤，晚餐是大饼、绿豆汤。郑振铎毫不言苦，他心情舒畅地写了一首诗《我们是普通劳动者》：

我们是普通劳动者，  
劳动神圣，  
劳动创造一切，  
从前只是谈谈，  
如今是亲身体会。

郑振铎写文章，反对雕琢与粉饰，主张直率和质朴。他的为人，也正是这样。

当年的郑振铎，已经年近花甲。他身为国家的文化部副部长，毫不以特权者自居，却为自己是普通劳动者而自豪！它生动地表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般的联系。

## 嗜书成癖

热心搜求中国的古籍，考定各种珍贵的版本，这是郑振铎一生的特殊的爱好。

作为一个勤奋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应从原始材料出发。面对着浩如烟海的中国的古籍，热心搜求，当然可以理解。郑振铎还有更高的思想境界。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

8月14日，郑振铎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的一百多箱古书，被烧得片纸不存。他看着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上升，心都被灼得疼。这时期，他买书，是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有一次，他见到中国书店将五千余本古书要论斤称走造纸浆，便竭力劝阻。自晨至午，仍无效果。他见店主执意要论斤卖出，毅然曰：“归予得之可也！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种书。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这段生动的记载，出自《蛰居散记》。这在日记中也有反映。他在1943年4月6日的日记中说：“近日旧书旧报，大量的被纸商收去造纸，将来若《九朝圣训》等大部而价廉之书，均将绝迹于世，实文化之一大浩劫也！思之，为之感慨无已！”1943年的物价比战前涨了一百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买书，“时之拮据，实缘于此”。郑振铎清楚地看到，“诚非穷书生所能负担也。奈何，奈何！”他只得节衣缩食，甚至戒烟。“自即刻起，戒烟不吃，好在香烟近日价又大涨，戒绝不吃，正是时候也。”郑振铎还密切注视着日本占领军是否把古书运走。抗战胜利以后，1947年2月6日，他在日记里高兴地记着：“得一电，知日本劫去之107箱善本，即可运到，幸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大量买

书，这里凝聚着一个学者的炽热的爱国感情。

1947年末，他在计划新的一年生活时，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用钱要有计划，要经济！少买书，不买俑！还帐要紧!!! 千万！千万!!一有了钱，便要胡花，万万要不得！非参考十分必要的书万不可滑手便买!!! 要记得还有许多帐未还，多少预约书未出版呢！”

1948年1月2日、3日，都有人上门要帐，使他“甚为不快”。三日那天，“一清早，索款者便纷纷的来，卖书的，印刷的，装订的，印零件的，均一一的对付过去了，好不麻烦！弄得腰酸头晕，总缘好事太过，故有此种烦恼也。”过了几天，一月六日，又有人来要帐，致使他暂时“不能付之”。他慨叹道：“总缘购俑购书太多之故、以一穷书生，万不能贪多务得也！以后切宜戒之!!! 非有余款，决不购物，否则，必得狼狈不堪！”要帐的接连不断地来，引起家里吵闹甚烈，“真有四面楚歌之势”。郑振铎说：“借钱购书，恐怕当今只有我一人也！”

面临经济窘迫的局面，能不能解决呢？办法是有的。一月十三日记：“心境总是不佳，不知何故！债务是一个症结所在，无债一身轻的经验，应该是有的。其实，只要肯‘割舍’，能弃去一部分的书，问题便完全解决。”显然，郑振铎不愿采用这个办法。但是，他家里“别无长物”，不得已时只能卖书。他的书，都是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而买来的。所以，卖书是他最痛心的事。问题复杂的是，有时见了好书好俑，他仍然要买。一月十九日，有人持“西域之胡俑”来，他“见之，不能不动心，即以二千元购下，债务则越陷越深矣！”他爱书，想买书，又无力偿还债务，只能节衣缩食。但是，矛盾仍不能解决，致使他白天“心境坏透”，夜里“整夜做着种种的梦”。临近旧历年，他还“尚缺三四千，不知如何办法好”！经济上的压力，使他无法“全力

从事写作及编纂”。元宵节到了。天气甚佳，明月高挂。郑振铎一家“似均无心度此佳节，物价飞涨不已，……小民们将如何活得下去呢？！”

解放以后，郑振铎生活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东风市场旧书店，他是常客。他的主要娱乐，是逛书店。他买到好书，精神振奋。在家休息，喜欢整理书籍。据1957年底的统计，他已编目的书有10845种，未编目的达5500种。他对各类书，都有详尽的统计。他还有一个目标：藏书三万种，三十万册，内善本三千种，二——三万册。解放以后，郑振铎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写书也有稿费，但以个人力量搜求古籍，仍然不够；致使他有时又要欠债。郑振铎的藏书，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在他不幸牺牲之后，郑夫人高君箴，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把他的各种珍贵书籍，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 勤奋的学者

开国以后，特别是郑振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之后，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勤奋的学者。

郑振铎最后一篇日记是这样的：“六时半起。八时许，到部办公。写《古本戏曲丛刊序》一篇。十时，到美术展览馆，参加一个画展的开幕式。十一时半，到百货公司购物后，回。理发。下午三时许到新宅。四时半，到东车站，接徐森老。遇斐云、仲超、全新诸同志。他住在故宫宿舍。说了好一会，即偕他和斐云到寓便餐。八时许，他们别去。整理东西。十时许，沐浴，即睡。”这篇普通的日记，就是他最后一天的日记，朴实无华，令人珍惜。他的生活很有规律。黎明即起。几乎每天上午到文化部办公。不管是迎来送往，接客、看稿，一切都办得认真。就是这次

出国的前一天，例应要作一些生活上的准备，可是，仍然伏案写作，毫不懈怠。他的一生，就是这样谨严地度过的。

郑振铎著述丰富。他自己编定了十卷本《西谛文集》的目录。他担负着繁忙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很多，取得这个成绩，已经很不容易。然而，他自己并不满足。1957年底，他订了庞大的写作计划。第一部分是“要完成的”，有：（一）古代版画丛刊初稿；（二）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三）文学史资料丛刊二册；（四）艺林新话；（五）古城古墓发掘史；（六）考古游记；（七）书林漫步；（八）访书日记。还有一类是“准备写的”，（一）石渠宝笈综编并索引；（二）寰宇仿碑综录并索引；（三）美术史资料丛刊；（四）戏曲史；（五）小说史；（六）文学史讲话（十讲）；（七）伟大的艺术传统；（八）艺术传统图录续编；（九）希腊神话。除了这些项目之外，他还在下面写了一些论文题目：《虞初志与艳异编》、《三国志演义研究》、《水浒传与‘官逼民反’及‘替天行道’》等。郑振铎还经常为报刊写文章，据日记载，1958年8月份写了九篇，9月份写了六篇。

一个人对自己提出的目标越多，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越严。他在日记里写道：“每天必得写些文章！”他的勤奋于此可以想见。意外的不幸，使这些计划不可能完成，这是我国文化事业的巨大损失！

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也总会有历史的局限性。这本来是毫不足怪的。1958年，对郑振铎进行了批判。正当《文学评论》编附页追悼郑振铎的时候，就在同一本刊物上，他正被当作重点批判对象。今天重读这本刊物，使人感慨万千，也使人加深了对郑振铎的哀悼和敬仰。本来，学术上的是非，应该允许进行讨论。但是，了解情况的同志都可以回忆起，当时的气氛，是一种“拔白旗”的政治运动的气氛。在批判中，调门很高，用

现在通行的话，就是“火箭上纲”。九月十四日，郑振铎看到北京大学学生写的批判文章，“十分地尖锐”，他仍然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在日记上写道：“这是‘一声大喝’，足以使我深刻地检查自己，并更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是痛苦的，但也是一帖良药。”在这段时间里，他在文化部领导成员中间，在文学研究所，都明确表示：“欢迎同志们多提意见，多帮助。……我表示愿意大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改正自己的作风。”这样的态度，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动。郑振铎不幸牺牲之后，对他的批判便停止了。这在当时的气氛下，已是难能可贵。但是，今天看来，在当时不可能对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在许多方面的成绩，作出公允的评价。历史把这个任务，一直留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应该担起这个任务了！

---

## 《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 (文献丛书)简介

本刊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出版这本史料性的书籍。本书包括为辛亥革命而献身的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四烈士的年谱。

本书内容比较充实，作者孙元超收集了有关四烈士的大量史料（包括谱主写的第一手史料和与谱主有关人士写的回忆资料），分别按年编排，并对史料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订。作者还收集到未曾发表过的徐锡麟的书札等重要史料，均附录书后，并附有征引书目，以供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参考。此外四种年谱各冠谱主之像，并附有插图若干幅。

全书共约十三万字。徐锡麟年谱约三万七千字，秋瑾年谱约五万三千字，陈伯平年谱约六千字，马宗汉年谱约九千字，附录约二万六千字。

本书是研究辛亥革命，尤其是研究光复会革命活动值得参考的书籍。

文 津